

第一章

我缘何年逾八旬奋笔疾书写日本

我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对一衣带水邻邦——日本的认识不是仅从书本上间接获得的，而是一生之中在战场、官场、商场直接与日本打交道的过程里，不断了解，反复加深，逐渐弄明白的。实践出真知。20世纪的经历，使我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这才得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不写出来就愧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战友和同胞；愧对国内那些有志借鉴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晚生后辈；也愧对希望日中世代友好，共同发展繁荣的日本友人。

“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与日本从小到大，结下难解难分的缘分。

一、忍无可忍 奋起抗击日本

1918年7月29日我出生于江南鱼米之乡的江苏省江阴县苏市桥小镇。父亲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无力上学读书。他勤俭纯朴，既耕田养殖，又开店经商，日夜操劳，所有积蓄都供子女求学上进，而且不分男女，先供两位姐姐求学。在他全力培植下，我大姐得以考入上海美专攻习油画，成为镇上最早唯一的大学毕业生，我

与二姐才能进省有名的无锡中学就读，我还以优异成绩直升该校高中部师范科。我们姐弟 5 人都好学上进，很争气。如果没有意外，我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但那时是动乱的年代，大环境不好，国家贫弱到了极点，政治腐败到了极点，世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我之欺辱也到了极点。为救国图强，无数仁人志士、热血青年奋起抗争。辛亥革命 经 10 次起义，虽推翻了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却被窃国大盗袁世凯阴谋篡权称帝，造成后来军阀割据之乱世。孙中山先生总结失败之教训，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广州起义后，北伐军得到全国民众之热诚拥护 势如破竹 起广州、克两湖、定江浙、平闽赣、建都南京 统一全国 指日可待。1928 年春，北伐军进入山东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竟出兵占领济南，阻止北伐。并公然将国民政府派遣前往调解之外交特派员蔡公时一行残杀。消息传出 举国震惊 才 10 岁的我听到这一无法无天的暴行，在小脑袋里就打上了仇恨日本的烙印。当时，学校中流行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版图像一片美丽的桑叶，而日本就是卧在其旁的一条贪婪的野蚕，它总想把桑叶一口口吞光的。以后的情景果然一幕幕发生，并愈演愈烈。

1931 年秋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 日本军国主义为执行其‘欲称霸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 欲征服中国 必先征服满蒙’的对外扩张战略 悍然于 9 月 18 日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军奉命不抵抗，东北三省一夜间竟被日军吞占。时隔不到半年，1932 年 1 月 28 日 日帝又在上海无端滋事 炮击市区 强占闸北 妄图一举鲸吞上海，威逼国民政府就范。岂料日军逼到国府心腹要地，是非得抵抗不可。驻沪十九路军在蔡廷楷将军领导下奋起抗争，前仆后继，上演了一场可歌可泣的大上海保卫战。2 月中旬 我年 56 岁的父亲 终因长年操劳过度 突患急性肠炎 水泻不止 未

过 3 日 即撒手西去。两位姐姐正困居上海 因战事阻隔 无法回乡奔丧。母亲日夜啼哭 痛不欲生 弄得我这个 13 岁的长子一愁莫展，真是国仇加家难，苦楚万分。这一事件对我一生影响极大，真切体味到 国家贫弱就必遭人凌辱 动辄打上家门口 来 真要当亡国奴了。所以立志努力读书 希望快快长大 救国图强。

日本军国主义这一连串之侵略行径，已充分暴露其“先灭亡中国，后独霸亚洲”的狼子野心。在举国上下，一片抗日救亡的声浪中，一直背着“不抵抗将军”恶名的张少帅与杨虎城将军联手，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 逼迫蒋介石顺应潮流 改变“先安内 后攘外”之国策。在各方携手努力下，“西安事变”圆满解决，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大家拥护蒋介石枪口对外 领导抗战。那时 我也信心倍增 认为从此中国有了希望。

可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绝不愿意中国各派政治势力联合起来 更不允许中国有起死回生、强盛起来的机会 遂于 1937 年 7 月 7 日在北平发动“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 我刚满 19 岁 高师毕业后 经大姐介绍 到南京她任教之花家巷小学当教员 并补习英语 准备来年考大学深造。听到这一消息 怒发冲冠，忍无可忍，决心投笔从戎，保国卫民。刚巧从报上得知当年 7 月中旬 军需学校招生 我也不知“军需”为何物 只要能马上从军入伍，抗击日寇即可。入校后 方知“军需”官是负责军中后勤补给“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之官员。这与我一心想上前线，指挥作战的初衷有出入 但“既来之则安之”先掌握军需业务知识 对将来改行当指挥官，也有帮助。这时日寇加紧了侵略中国之步伐，妄图利用其武器装备上的优势，速战速决。不久首都南京沦陷，日寇丧心病狂，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想以其淫威，摧垮中国军民之斗志 尽快征服中国。政府迁都重庆 需校也一再搬家 先迁江西南昌，后转重庆对岸之江北县，所到之处时遭敌机轰炸。1939 年 5

月 3 日至 4 日，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陪都重庆狂轰烂炸，将山城上下烧成一片火海，成千上万无辜民众惨死。我在江北防空洞中亲眼目睹了这一残暴罪行。从此，操练更加勤奋，学习更加刻苦。1939 年秋，我以总成绩 93.1 分，名列军需学校十一期毕业生之第一名，留校服务（任命为少尉助教，会计学）。

需校毕业后，为达到带兵打仗之目的，我即参加了军校十七期之新生入学考试，并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需校教育长也为我的志气所感动，破例对我转校之请求“特予批准”。我得以堂堂正正从需校毕业，又堂堂正正进入军校。当初绝没想到，我虽未干上一天军需，反在日后到日本，脱下军装改行经商后，将在军需学校所学经济、财政、统计、会计诸门知识统统派上用途。军校教育训练开始后，对入伍教育等共同性科目，我是驾轻就熟，轻松愉快；对学科、术科也是温故知新，对野外演习更是得心应手，常充当班、排、连长，指挥若定；上政治课，也常有独到高见，颇受同学称道。这座自“七七事变”后迁址成都的军校，经两年多建设，已有相当规模，成为国民政府训练陆军军官之大本营。军校的基本教育与训练是不错的，教官整体素质也较高。但在两年多训练生活中，也发现如下问题：

一是营养不良，经营不善。学校伙食极差，主食多为掺砂子的杂粮，副食是白水煮青菜。这与军需学校在战时仍能保持白米、白面、四菜一汤的状况，真有天壤之别。由于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许多同学染病，吐血不止，往往在本校医院救治，不到一月就命丧黄泉。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我们总队入校时有学生 2000 人，毕业时只剩下 1800 名，这 1/10 的同学还未上抗日前线，就白白葬送了年轻的生命。

二是主义信仰不坚。上“三民主义”课时，教员照本宣科，枯燥乏味。同学心不在焉，甚至打瞌睡。课后还说：“这是卖狗皮膏药，

没意思。”主义不坚 缺乏动力 何以战胜强敌 为此 有的同学甚至偷偷加入当地的青红帮黑社会组织，企图日后办事方便。

三是绝对服从蒋介石个人。军校的教育从上到下，都贯彻绝对拥护、无条件服从蒋委员长的原则。即使提到委员长的名称，就都要起立、立正，表示最高的崇敬。这同当时希特勒、墨索里尼倡导之纳粹风气，如出一辙。蒋介石是从当黄埔军校校长起家的，他深知握有枪杆子的重要性，无怪他不仅是军校的校长，还是三军全部军事学校的校长，也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国民党政府之文官、武将 可说全是他的门生。但仅靠这种手段 就能统治天下吗？

1942年4月15日，我在军校十七期一总队以总成绩第一名毕业。校长公务繁忙，特派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上将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白部长训词后，颁发第一名至第五名的奖品，然后由我代表全总队领佩剑，致答词，真是风光一时。军校毕业后，奉命留校服务，任命为陆军步兵少尉、军校十九期一总队教育班长。教育班长要与学生同生活共甘苦，等于是我第三次入伍过士兵生活。我亦以苦为乐，一改以往拳打脚踢之练兵方式 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 使新生口服心服。

正在紧张的入伍生教育中，突接我同队同学朱国勋从第一师发来的信函，征求我的意见：“有没有意思到胡宗南统率的第一师服务。”如有 他可以请其伯父、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先生设法请调。此意正中下怀，我早想毕业后能上战场与敌拼个你死我活。胡宗南是黄埔第一期出身，已由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连升至第一战区副司令并兼 34 集团军总司令 统辖 30 万大军，除防守河南及陕西的日寇进攻外，还负责对付陕北之共军。人称“西北王”在国军中是公认的最高领袖最信任的将领 亦属最有希望的接班人之一。如能调第一师任职，在军界将大有作为，故立刻复信“同意请调”。不想请调我这个小少尉班长，还费了一番周

折。第一师首次发电请调 军校本部复电“ 不准 ” 后朱秘书长直接出面请调，才惊动万教育长的关注，特别下令批准。放行前校本部办公厅主任亲自召见 慎重告之：“ 陶同学 第一次胡副长官来电请调未行批准，是因为校长在你的毕业论文上手批着 ‘ 该生品学兼优，应予毕业后优予使用 ’。现在朱秘书长再来请调，教育长方才同意。但是 你去第一师后 如有更动 望即与校本部联络 万一校长找人 我们可马上找到你。”听后 真是受宠若惊 日理万机的最高统帅，那能记起成千上万芝麻绿豆大的小官，此举是重视人才，还是笼络人心？

第一师驻守潼关，东面监视河南洛阳以东的日军以防其西犯，北面隔黄河与对面山西省风陵渡之日军遥相对峙，这是保卫西北之屏障，任务险巨。师部驻扎在离潼关城约 5 公里的小村里。旁靠小山，沟中挖有窑洞，既可作营房安身，亦可避风陵渡日军炮火之攻击。那时，接济当地驻军之弹药、物资多靠潼关至洛阳的陇海铁路承担。但潼关附近几百米开外，没有掩蔽，还正对着风陵渡日军之炮口，所以每逢火车开到这个缺口时，必须加大马力，高速冲过，免被日军炮火击中。铁路员工及押运官兵的英勇壮举，令人敬佩 这就是有名的“ 闯关车 ”。日军经常炮击“ 闯关车 ” 亦时而炮轰司令部，所以须随时警戒。

第一师的编制与装备是国军中的佼佼者 人事亦很整齐 师长以下，排长以上，都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军官。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刚从德国军官学校毕业，就派来充任第三团第五连上尉连长。我报到后，先在师部参谋处当少尉见习官，一月后，调任司令部直属特务连当少尉排长。第一师防守潼关 虚名远扬 中外团体、宾客常来参观 遇有外宾光临 我们这些能通英语的军官 就要大忙特忙一阵。为应付外国贵宾的来访 奉参谋长之命 我还在司令部开办的初、中级英语班当教员。后来参谋长李祖唐少将军

校四期 陆军大学高材生 又命我于每周二、四、六下午 陪他研读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每周评论》。陪读完 又总留我与副师长、党代表、参谋处长 4位最高长官吃晚饭，真成了一位特殊排长。1943年夏，为提高军官的素质，司令部举办干部训练班，我临时调任教育参谋 两个月结束 我因有功晋升为中尉排长。

在驻守潼关的某天午夜 官兵都在熟睡中 突然听到距我排驻地约 200米处，一声巨响。大家知道这又是风陵渡日军对司令部炮轰了，随全副武装准备去邻近的山沟避弹，全排还未离开驻地周围的土墙 第二发炮弹又呼啸而至 听声音似就在我头顶“轰”的一声巨响，全排迅速卧倒，我头上身上满被泥沙覆盖。真险！这颗炮弹就在我排土墙外 5米处爆炸 若是打进墙来 我们全排就完蛋了。我们抖落泥沙，迅速转移至山沟，第三发炮弹随之又到，我排已安然无恙。真是吉人天相，有惊无险。

中原河南一带，久无动静。1943年秋，日军突从开封一带发动西攻。汤恩伯部不堪一击，洛阳陷落，日军几乎席卷河南西部，其先遣部队，已距潼关数十里，大有直取潼关之势。胡宗南大为震惊 动员三十四集团军第一军 3个师紧急应对。第一师首当其冲，司令部即刻东进，准备迎头痛击日寇。特务连当然随司令部前出，保卫其安全。到前线村庄一看，众人皆大吃一惊，村民已逃匿一空，村中鸡鸭猪羊，皆被败退的汤恩伯部洗劫一空，连棉被之绸面都被抢走 棉絮满地。结果是日寇还未到 百姓先遭殃 奸淫掠夺，无所不为。直到胡宗南总司令当场枪毙了一个团长，军纪士气方见好转。久闻汤部污名，今日才见真相。

正当我们决心与来犯之敌拼个你死我活之时，不料日寇却自动撤走了。日后探知是日军战线太长 补给不足 故无力再进攻西安。3天后胡宗南从西安来到潼关，召集第一师连长以上军官在山沟广场训话 开口就吹：“你们看 日本小鬼子听到我第一师的威

名 就望风而逃了。’真是既不知敌 也不知己。根据我到第一师两年的观察，胡宗南的起家之师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军纪不严。第一师师长李正先因与胡既是同乡，又是黄埔同学，还是在一师拼杀过来的患难之交。就因未按其意图升任第一军军长，而闹情绪。在日军大兵压境，欲侵犯潼关的紧急关头，竟一直称病在华阴休养。我在第一师服役两年，除了最后逼得他非到他不愿去的另一军，接任军长之时，才从华阴回师部交接外 就没能见其尊容。俗话说：“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对这样不识大体 不顾大局 闹情绪 泡病号 大敌当前放弃职守的将领，不加管束，怎能带好兵，打好仗？使我对胡的印象大打折扣。

二是训练搞花架子。第一师训练有素，美名远扬。每逢中外贵宾来参观，司令部组织的沙盘演习与实兵实弹演练，均井然有序，激烈精彩，博得掌声一片。但这仅是经过特别训练的一支特殊小分队而已。团营连平时的战斗战术训练就很差劲，全师范围的竞赛，两年中未搞过一次。以我所在的特务连实力来看，久经训练的老兵只有 1/3 有 1/3 的新兵连瞄准都成问题。胡宗南蒙了别人 也骗了自己。

三是“吃空名”严重。在第一师“吃空名”已是公开的秘密。以连的建制约 130 名士兵计算 连里大概要吃一成 营长要在各连挂 5 名空额，那么各连的空名就在 20 人左右；师直属部队就更有问题。据说驻在西安近郊的一个师，全师实际仅有 3000 人。堂堂有名的第一师竟变成这样，实在骇人听闻。以这样的部队与敌真的交手 岂有不败之理。

我原是慕胡宗南之名而来，但两年来的观察，大失所望，他徒有虚名而已。据说，抗战初期南京沦陷后，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上将 在检讨报告中，曾呈请最高统帅要重罚作战不力的胡宗南，结果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宗南无用 忠实可靠”不了了之。抗战后期

胡所管之战区与日军无多大战斗。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破裂，胡率大军进占共军根据地延安，曾得意忘形，可惜昙花一现，好景不常。以后被共军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处处挨打，无力招架。1949年西北全部变色，胡率残部退入四川，最后保驾失败，落荒而逃，窜入西康，生死不明。以后在台北狼狈出现，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昔日“西北王”，在宝岛几无立足之地，曾一度受命去指挥芝麻小岛——大陈岛之驻军，真乃极大讽刺，不久便郁郁而终。

1944年，日军由湖南、广西发动西攻，其势凶猛，竟一度紧逼到贵州之独山，大有切断重庆政府后方补给生命线之危险。蒋介石忙发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壮烈号召。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响应，参军救国。为带好这批以中学、大学生为主的青年军，准备接收、掌握好美国新式武器，总部特下令给中央各军师“迅速选拔优秀干部立刻到重庆报到受训”。第一师被指名选派10名干部，其中有三团五连的蒋纬国连长，二团我军校的同学朱国勋、钟树森和师部唯一一名的我。大家满怀希望，先后赶往重庆。经过6个星期集训，在参训的120名军校第二期至十八期的军官中，我仍以首席结业。被分派到青年军201师服务，在司令部任教育参谋，负责全师教育训练计划安排。万事开头难，师组建后，训练任务重、要求高、时间紧。我日以继夜，精心编制第一年的学术科教育训练进度表，一周之内完成，大受参谋处长、参谋长等赞赏，所以到职不过3个月就晋升上尉以资嘉奖。后来，我又“毛遂自荐”到当时文化程度最高、军风纪最差的司令部直属搜索连当连长，并向戴之奇师长立下军令状：“如在1个月内不刹住歪风，请记我一大过；如在3个月内不改变面貌，请将我撤职严办。”我上任后，经过调查在一周内先处理了从国民党中央党部过来的一名偷奸耍滑，泡病号，混日子，无人敢管的捣蛋鬼。真是杀一儆百，士气大振。我与士兵同吃同住同甘苦，要求下属做的，我首先做到。我不仅在战技术训练

上可以当他们的教官操课之余我还同这些学生兵一起学英语、打篮球，做他们的朋友，连队面貌迅速改观。两周后，在司令部直属部队的术科比赛中，搜索连夺得冠军。1个月后师长发布命令，任命我连为司令部军风纪纠察队。师长下团视察，也总令我连篮球队同行每每旗开得胜常受师长嘉勉。

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以新式装备与敌决一雌雄之际。1945年8月15日下午4时左右，突然听到无线电广播中报告：日本天皇已向全世界公开广播“无条件投降”了。同事们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燃放爆竹，庆祝胜利。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国军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场上苦苦鏖战了8年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胜利来之不易呀！想当初，日寇是何等的嚣张鲸吞东北、占领南京、横行华北、中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南京大屠杀”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时起，一直持续到第二年1月上旬尸叠如山血染长江。集体枪杀、火烧、活埋我军民约34万人。从1939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华中实施大规模、长时间的“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公然向我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为了劳军还强迫我沦陷区妇女充当“慰安妇”。真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不错，当时日本是一个新起的帝国主义强国，他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但它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加上它国小人力、物力、军力、财力不充足，它只有速战速决，而无力持久抗争。而我们中国虽然贫弱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不如它强但我们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与其长期抗衡。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之战，能得到全国军民和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到抗战后期，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它一面要对付正面战场之国军，又要防范另一战线之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腹背之游击队。在数万万奋起抗争的我

国军民面前，它真像一头冲入火阵的野牛，迟早非烧死不可。中国人历来就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还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不知日本能否从这场败战中，总结应有的教训。

二、赴美受训，有幸进驻日本

1946年初夏，根据中美军事协定，美将支援国府大批美式装备。国府决定选派大批军官留美培训，我荣幸的成为全师唯一一名被选派的军官。赴南京决试又顺利通过。8月初我们第一批20位同学，由上海乘美军C47运输机赴美，途中在日本厚木机场加油。触景生情，真想好好看看这位昔日沙场对手之“庐山真面目”，可惜在机场一起一落，来去匆匆，是什么也看不到的，不知何时能够再来。

美国步兵学校设在乔治亚州的本宁堡，是闻名中外、世界最大的军事学校。我们这批军官是与西点军校1946年班刚毕业的军官同队受训。前3个月是综合教育，后8个月是分科教育，重点是班、排、连、营的战斗与战术。这当然与中国传统的军事训练有所不同，如何结合中国实情运用好，将是一个难题。我在美国除努力学习掌握美军之新式装备与战斗战术外，更加关心的还是中国国内之时局。因为，当我飞离大陆之时，内战已经爆发，在国内听到的都是国民党政府一面之词，而在美国这样一个新闻“自由”言论“开放”的国度，让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奇消息，决然不同的评论，真是大开眼界，得益匪浅。

一是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内幕的揭示。这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是难以见到听到的，而在美国这种书籍比比皆是，真名实事，来龙去脉，一清二楚。虽令人真伪难辨，疑信参半，但却令我深

思，尤其是孔宋之操纵国内的财政金融，如探囊取物，几家国家大银行，像是他们家的账房，取用方便之极。这些对国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如不澄清 等于默认。

二是对共产党、红军的报道全是新闻。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听到的只有攻击与谩骂 什么“朱毛匪帮”“共产共妻”等等。现在由美国记者所写的采访报道，却决然不同。我才第一次了解红军是怎样冲破重重围追堵截，克服难以想象的自然险境，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遵义会议是如何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危局的。在完全封闭，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共产党是怎样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动组织民众，生产自救，成功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采访则更具传奇色彩。正因为如此延安正吸引大批有志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前往。

三是对中国内战的报道大多对国民党政府不利。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调解国共两党纷争失败后，出任美国国务卿，故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常常发表攻击国民党政府的言论。一部分政论家在中国内战爆发后，亦常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的文章。有一则新闻令我大吃一惊：原来派我去搜索连任职的青年军二〇一师师长戴之奇少将，在内战中率领一个整编师与共军激战，竟全师覆没，自己自杀身亡。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947年8月中旬，战后第一批留美军官 200 多人集中到旧金山海军基地，搭乘美国海军运输船回国了。途中要在日本横滨港停泊。我们这批军官都是 8 年抗战中受过出生入死洗礼的，既然来到对手老家，就想好好看个究竟。

我们几位同学，被驻日代表团邀请去东京观光，回船后报告说：东京除沿皇宫附近一带的大楼保存完好外，其它地区都遭美国 B-29 飞机的狂轰滥炸 焦土残壁 随处可见。有几幢完好的大楼

亦归盟军总部征用。百姓衣着破旧，面黄肌瘦，终日为三餐辛劳，尚不得温饱。想起日本飞机对重庆之狂轰滥炸，真是恶有恶报。第三天 运输船离港 驶向上海。

1947 年 8 月末，回国后即被派往南京步校，任命为少校战术教官。那时步校教官以留美军官为主，还有几位美国顾问。最初半年 忙于备课 以后淮海战役吃紧 学校准备南迁 军心动摇 教育大受影响。本来自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的 14 年间 中国国力大损，百姓吃尽苦头，急需休养生息，合力复国建国。美国也看出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 前途无望 而共产党正朝气蓬勃 潜力可畏。为阻止苏联势力向东漫延，保护美国在华及亚洲的利益计，杜鲁门才派员来华调停，以先稳住时局。不料蒋介石执迷权力，自信拥有 300 万陆海空军，大批美式装备，可一举消灭共党共军，永保蒋家天下。谈判破裂 重开战局，3 年不到 万里江山 拱手让人。究其败因 无外两条：

一是政治腐败，大失民心。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之百姓本都像久旱盼甘雨一样等候国民党政府回来。结果是接收大员们贪污成性，大发接收洋财，把沦陷区之人心都接收光了。百姓怨声载道，真是“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弄得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生产停滞 物价飞涨 货币贬值 学生“反饥饿、反内战”之游行 此起彼伏。反观共产党建立之根据地、解放区内，却真正实行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赢得了亿万农民的拥戴 纷纷送子参军，“保家保田”。加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同甘共苦 纪律严明，清正廉洁。战火一开，百姓推着小车送粮支前。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也。

二是军事无能，溃不成军。内战初期，美军顾问曾建议，困守东北城市孤立据点之国军，应保存实力，迅速撤至黄河以南，择地与共军决战。哪知 蒋介石之战略恰恰相反 坚持以美式装备而在

印缅战胜日军的远征军，新一军及新六军等孤守长春及沈阳等据点，并派陈诚为东北剿匪军司令，孤注一掷，以求速胜。结果被共军分割包围，粮尽弹绝，各个击破。美式装备全为共军缴获，如虎添翼，益发威猛。东北失手，关内危急，几百高级将领集合于南京中山陵哭祭，要求重惩陈诚，但为时已晚。共军乘胜追击，直逼陇海，等到国民党政府最后一张王牌、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亦一筹莫展，真是山穷水尽，兵败如山倒了。江山异帜已成定局。

政府南迁广州，我亦被迫去广州国防部报到。战局每况愈下，政府又有意再迁重庆，国防部里一片混乱。我的名字就挂在国防部四厅三处，等待分配。1949年3月初，该厅四处处长阮维新上校约我面谈，问我是否愿意去东京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服务，听后喜出望外，当然应允。原来为密切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关系，上面决定再任朱世明将军充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朱又调阮处长为驻日代表团后勤处处长，阮有意调整该处人事，知我毕业于军需学校，留美归来英文不成问题，所以签呈国防部“请准调国防部少校参谋陶萃权为驻日代表团后勤处少校参谋代理副处长职务。”1949年3月中旬，肩负占领日本之神圣使命，在香港搭乘克烈夫兰总统号运输船直航横滨上任去了。不想这第三次光顾日本竟一呆就是半个世纪，把战后之日本看了个仔仔细细。

战后盟军总部对日本的占领，名义上是对日作战之中美英苏4国为主联合占领，而实际却变成美国一家单独出兵占领。麦克阿瑟几乎可遵照美国政策为所欲为成了占领日本之太上皇。4国代表开盟总会议时英国追随美国，一唱一合中国仰赖美国亦步亦趋；苏联孤掌难鸣，总是三对一通过美国提案。

在讲究实力的当今世界，历来弱国无外交。何况国民党政府已被赶出大陆是孤居台湾之偏安政府”既想仰仗美国武力反攻

大陆，又望日本协助扼制大陆，处处仰人鼻息，那里还谈得上外交之主动权。驻日代表团则更是一个传递外交信息的前方办事机构，一切外交事务均由“总统”通过张群指挥外交部办理。我在代表团这 4 年期间，亲历眼见几起丧失国格人格之事件，让人刻骨铭心，切齿难忘。

一是败退台湾，美援断绝，偷拜世仇为师，妄图再造国军。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美国国务院亦在当年 8 月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明白表示：国民党因贪污腐败，无德无能，力量已削弱了，意志已消沉了，失去了民心。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盛。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南京失守后，仍迟迟不撤退，种种蛛丝马迹，不难看出美国向新中国暗送秋波的真意。此举震惊世界，尤其对岌岌可危之国民党政府，几乎是致命的打击。看来美国的经援、军援均已中断无望了。蒋在沉痛失望之余，遂与日本首要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1949 年初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暗中密谋，请其选派优秀旧部，来台湾充当军事教官，用日军之战略战术教育国军干部，以图国军之再造重生。冈村积极筹划选定了以侵华军官富田直亮少将为团长的 85 名旧军官赴台。为严保秘密，以防风声外露，所有日本教官都取了中国姓名。例如：团长富田直亮的中国名字叫“白鸿亮”，教官都甲诚一的中国名字叫“任俊明”，而冈村则被尊称为“甘老师”。于是在台北近郊暗地里开设了一座地下大学，国民党政府之中高级将领均轮流前往受训。“白军团”之名在台北悄然流传。为使这批日本军官安心在台任教，蒋还密派其亲信，资深位高之情报官蔡孟坚去东京，负责照顾补给这团教官的眷属，可谓用心良苦，安排周到。蒋介石真可谓病急乱投医。想当初，内战中，国民党政府有大批美国军援装备国军，有大批留美军官效力国军，但终因政治腐败，民心丧尽，难挽败局，大批美式武器

拱手让人，被国人讥讽为“运输大队长”。本应吃一堑，长一智，自责自律，寻求自立自救之道，现在却故技重演，竟拜世仇宿敌为师，岂有成功之理。此门一开，无异引狼入室。以后日本经济复兴，台湾经济完全依赖日本，政府对日本之一味迁就姑息，甚至卑躬屈膝，低三下四，造成民间一股亲日媚日的歪风，导致后来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一心想搞台独，数典忘祖，以当日本皇民为荣，连自己都是中国人都不愿承认。冈村死后，于 1975 年 6 月 7 日在日本结成“冈村宁次同志会”，由都甲诚一负责。我退出军界后，被推选为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之“荣光联谊会”（即退伍军人协会）会长，经常与都甲联系。国民党政府是想借此影响日本自卫队，甚至日本政界，能支援蒋之反攻复国政策。而日本右翼与自民党内保守派系的支援，则别有用心，一方面对新中国不敢轻视；另一方面对宝岛台湾又念念不忘。所以，台独及独台之大本营、根据地都在日本。

二是朝鲜战事爆发，日本成了美军之后勤保障基地，国民党政府追随美国梦想重返大陆。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南韩军节节败退，美国绝不容其在亚洲之桥头堡丢失，遂直接出兵干涉。驻日盟军总部立刻变成应付韩战之总司令部，日本变成了联合国军之后勤补给基地。大批战备物资源源不断供应美军，无数美元亦纷纷装进日本腰包，为日本经济之复苏注入了强心剂。

麦帅狂妄自大，不料被中朝军队打得狼狈败退，在朝鲜栽了跟头，被总统撤职调动，黯然回国，失去了当日本太上皇的荣光。美国乘朝鲜战争之机会，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直接插手中国之内战。国府对此求之不得，以为有了保护，可借美国之力反攻大陆，但这样一来台湾就成了美国的附庸，那还有什么自立与主权可

三是在美国策划下，蒋介石以德报怨，签订中、台、日和平和约。当朝鲜战事进入胶着状态后，美国即积极进行与日本单独订结和平

条约的事宜 因为若全面媾和 苏联歧见很多 难以对付 中国代表权问题也会扯皮，与其久拖误事，不如快刀斩乱麻。美国遂迅速单独与日签订和约，同时签订美日安全保障协定。这样一来，盟国占领日本正式结束，而美军事上仍占领着日本。日本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附庸，一举多得，从此奠定了美国称霸亚洲的地位。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与美日安保条约同时签订后 美国忙派反共干将杜勒斯幕后积极策划中 日和约的签订。当时日本吉田首相竭力反对 他认为仅与控制台、澎、金、马小岛之国民党政府签约，而失去无限广大的大陆市场，日本为此在经济上遭受的损失太大，是得不偿失，不能同意。杜勒斯除在政治、军事上对日施压外，还同意在经济上对日特别补偿。吉田这才勉强同意。本来应该是战败的日本恭恭敬敬向战胜的中国请求签订和约，现在反倒要中国去恳求日本，还得加上美国的大力施压，才能媾和签约。这成何体统？有何脸面？我4万万同胞 浴血抗战八年 付出巨大代价 才获得最后胜利 而这次与日本签订的和约 我们得到了什么呢？除受到再次的耻辱外，对中国人民来讲是一无所所有 而对蒋介石来讲 却有点安慰 那就是在美国压力下 日本承认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代表全中国。真是强词夺理，滑天下之大稽。

蒋介石为此在当时提出“以德报怨”的四大德政 事后研究实在大有问题。今分述如下：

第一，维持对外侵略之祸根——天皇制。天皇是日本国家的元首，是日军的最高统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愚弄日本军民的精神支柱。“为天皇而生 为天皇而死”使多少人白白葬送了宝贵的生命。对这场侵略战争之罪责，天皇是理应承担的。为防止侵略战争之再起，天皇制也本该彻底铲除。不想这次签约，不仅不追究天皇的罪责，而且保留了天皇制。这就为